

超越现实主义？

冷战后的北约及美欧联盟关系

钟振明◎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超越现实主义？

+

冷战后的北约及美欧联盟关系

钟振明◎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现实主义? 冷战后的北约及美欧关系/钟振明
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520-0416-8

I. ①超… II. ①钟… III. 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概
况 IV. ①E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0104 号



超越现实主义? 冷战后的北约及美欧联盟关系

作 者: 钟振明

责任编辑: 杨 国

封面设计: 黄婧昉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416-8/E·001

定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就发起了对苏联的冷战,并同西欧10国及加拿大组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其承载的美欧联盟关系(即所谓的“大西洋联盟”)的主要战略任务是应对并遏制来自苏联的威胁。近半个世纪之后,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华约的解散和苏联本身的解体,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在国家利益和政策优先目标等方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歧,北约的力量、效能乃至其能否持续存在都一度受到人们质疑。然而,时至今日,北约不仅没有走向解体,反而在成员规模、力量结构和战略使命等关键方面进行了持续的调整,在此基础上,北约正逐渐化身为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可借以实现各自安全和战略利益的多功能组织,并在冷战后时代积极参与了传统防区外的多次军事行动,从而展现了北约应对新形势的自我改造能力。北约及美欧联盟关系的持续存在和发展是决定未来欧亚大陆战略格局的重要因素,其变化的缘由、内涵、趋势及其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意义也因此值得国际关系学者去探讨。正是带着解答这些疑问的目的,笔者通过本书研究了冷战结束后国际权力新格局下北约组织的演变及其关键调整,以及由此反映出的美欧联盟关系的变化。全书从北约主要成员国之间围绕权力与安全目标而进行的角逐这个角度,分析北约在冷战后发生的一系列发展变化,包括北约的持续扩大、围绕北约建立欧洲力量支柱而进行的斗争和妥协、北约战略概念和主要任务的持续调整,以及北约在冷战后发生的若干次重要国际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等重要议题。

笔者分析了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和威胁均衡理论对北约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也考察了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对联盟持续原因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理解和预测北约在冷战后的演变,需要把握几对重要关系。

第一，权力结构因素和非权力结构因素的关系。冷战结束后，欧洲地区出现的新权力结构为北约这样的军事联盟的继续存在和变化不仅提供了约束条件，同时也创造了机会。西方在冷战时期所担心的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由于苏联解体和华约解散而荡然无存了，但美国及其北约欧洲盟国基于各自在特定国际权力结构中地位的考虑而纷纷支持延续并扩大美欧联盟关系。美国希望通过延续和强化北约这一军事联盟组织来服务于其永久化“单极一刻”的战略，从而享受“单极”地位给它带来的领导乃至支配世界的好处。对于北约欧洲国家来说，继续维持与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军事联盟关系仍然是维持它们在国际权力结构中既有地位的合理选择。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北约内部出现的诸如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稠密的制度网络、共同身份认知等非权力因素的辅助作用。

第二，联盟内部需求和联盟外部压力的关系。自1949年北约成立至今，该军事联盟组织内部已经客观上形成了一股比较稳定的主张维持该联盟组织继续存在的力量。各成员国普遍希望通过延续这种军事联盟的安排方式，来应对各种潜在的安全挑战，而不是通过解散这个组织并以不确定的其他安全安排来满足它们各自的安全需求。与此同时，北约之外的几支外部力量在新的国际格局和安全形势下所作出的反应也客观地促进了该联盟组织的持续存在、扩大乃至强化。一是冷战时期被苏联所控制的中东欧国家，它们在冷战体系崩溃后纷纷提出所谓“回归欧洲”的概念，要求加入欧盟和北约；二是像俄罗斯这样被北约视为潜在威胁的国家的政策走向，影响了北约本身的联盟凝聚力，一部分对俄罗斯持有疑虑的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甚至也迫不及待地希望加入北约；三是冷战时期东西方结合部存在的各种动荡，如南斯拉夫内战和苏联、东欧国家的分离活动，在客观上促使北约国家更加重视北约组织本身的安全保障功能。

第三是体系层次因素和单元层次因素的关系。从体系层次上说，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际体系中特定权力结构下所限定的安全诉求是国家的最高利益，面临一个变动国际结构下的外部环境，北约组织各国基于国际理性所作的判断将压倒国内理性，这种体系层次的主导性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北约组织和大西洋联盟关系得以持续存在和发展。但是，国家的具体对外行为，包括联盟政策行为，也是通过国内理性的运作而得以体现出来的。就北约和美欧联盟关系的维持和发展问题而言，北约各成员国的国内制度结构特别是政权的汲取能力和动员能力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各国对于维持所

谓大西洋联盟关系的利益和立场首先是有赖于各国政治精英的主观定义和国内政治运作的结果。此外,对于标榜多元化的西方各国而言,国家利益和国家偏好也是社会集团进行政策和权力竞争后的产物,国内社会层面的次国家行为体(如利益集团)也在决定国家对外行为中发挥作用。

第四是传统安全需求和非传统安全需求的关系。冷战结束后,北约成员国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已经大为降低,但传统安全防御的概念已经发生变化,在领土安全、国民安全和政权安全方面,北约更多地倾向于主动通过在境外展开行动,来塑造有利于北约成员国的传统安全环境。此外,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来自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跨国犯罪行为、传染性疾病预防、网络攻击和极端气候等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涌现,而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跨国、跨地区乃至全球蔓延的特点,需要北约通过集体力量予以应对。这样,在塑造传统安全环境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两方面,其成员国都对北约和美欧联盟关系产生了新的需求。

在对冷战后北约的一系列发展变化的分析中,本书利用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北约组织及美欧联盟关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原因进行了现实主义途径的诠释。本书认为,经过正确理解后的现实主义理论仍然可以解释北约组织和美欧联盟关系在冷战后的继续存在和发展。现实主义的解释强调人们应该继续关注国家,尤其是大国对于它们在特定国际结构中相对权力地位以及安全目标的追求动机。美欧联盟关系和北约组织的未来走向将在根本上取决于它是否满足北约各国,尤其是其主要成员国所理解的各自对外战略和国家利益的需要。此外应当看到,经过冷战后一系列的战略使命调整,北约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军事防御组织,而是日益成为一个具备多重内外功能的政治与安全组织。北约在冷战后多次跨越传统防御区域实施对外军事干预,不仅让其有机会实践这种调整中的新功能,而且帮助北约找到了继续存在并发展的新理由。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现状	2
第二节 研究的方法和各章概述	11
第二章 对联盟持续存在和发展现象的解释：理论与争论	21
第一节 现存现实主义联盟理论的解释	23
第二节 非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	35
第三节 现实主义解释模式是否过时？	53
第三章 北约调整之一：扩大	67
第一节 关于北约是否扩大的讨论及北约扩大的原因	68
第二节 冷战后北约首轮扩大计划的推行	81
第三节 北约继续东扩	111
第四章 北约调整之二：北约欧洲支柱的发展	120
第一节 北约四大国对于欧洲安全与防务合作的态度	121
第二节 美英法德四种途径的妥协与北约欧洲支柱的发展	141

第五章 北约调整之三：战略使命的再定义	154
第一节 冷战后北约在调整使命方面的努力	155
第二节 对冷战后北约功能的再认识	170
第三节 北约积极介入区域外冲突和战争	178
结语	196
资料附录	199
北约大事记	203
参考文献	207

第一章 导 论

本书主要研究北约组织及美欧联盟关系在冷战结束后的演变及其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意义。以现实主义为研究角度的学者强调强权威胁对于联盟的形成和联盟凝聚力的维持所产生的关键影响,而对于联盟形成时所针对的强权威胁消失后该联盟的未来走向问题没有作更多的分析,只是在总体上认为那将导致联盟凝聚力的降低,并最终导致联盟的解体。由此,许多现实主义者都对冷战结束后北约这一联盟组织的发展前景持悲观的态度。

然而,正如现实所表明的,冷战结束迄今,北约组织并没有出现任何可能解体的迹象,相反,这个联盟组织正在经历着它诞生以来最为深刻的变革:它实现了北约在冷战后时代的三轮扩大,并且可能继续向东向南扩大;它正在调整其军事力量结构,在北约的美国力量支柱外发展北约的欧洲支柱;它正在发展一系列超出传统的军事防御范围的新使命。在诸如南斯拉夫内战、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等一系列区域外危机和战争中,我们至今仍然可以看到北约积极介入的身影。尽管不再面对现实的领土安全威胁,但各种潜在的传统安全威胁和诸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也似乎让北约的持续存在有了新的理由。总之,这一切使得以现实主义的角度对北约未来进行的预测遭到广泛的批评。

不过,虽然许多现实主义者对北约未来的预测没有同北约在冷战结束迄今的发展事实相吻合,人们却不能轻率地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假设就是致命错误的。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比较它与反现实主义的理论在这一领域内相关问题所作解释的分歧,分析现实主义对于解释联盟的形成、持续和调整等问题上所具备的优势,然后发现现实主义的不足之处或者它在某些方面解释力的有限性,最后对现实主义的联盟理论作出相应的补充说明。本书试图提出一种改进后的现实主义解释模式,这一解释模式将在现实主

义的均势理论和威胁均衡理论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国际无政府状态性质下的相对权力格局(国际结构),国家对于相对权力和安全的追求,国家对于既有联盟组织在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能发挥的功能的认识,以及国内政治因素等对于决定特定国家联盟政策行为所起的作用。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选择的是体系层次分析和单元层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它既认识到体系层次对国际政治的首要决定性,同时又重视单元层次对国际结果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对国际政治的研究离不开对国家本身结构、决策者所持有的历史哲学和政治价值观,以及国内利益集团差别的分析的支持。在说明了上述问题后,本章最后将对本书各章的基本内容作一扼要的介绍。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现状

现有的关于联盟现象的理论分析其实在研究范围上是十分狭窄的,正如美国学者格林·斯奈德(Glenn Snyder)所指出的:“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一个最不成熟的研究领域就是对联盟理论的研究。”^①现有的研究联盟现象的文献一般集中于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关于联盟形成的原因;二是关于联盟形成后影响联盟凝聚力的原因。^②但是,关于战略环境变化后一个联盟

①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Balance, and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nter 1991), p.121.

② 现有对联盟现象进行理论研究的文献主要包括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87); George Liska, *Nations in Alliance: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Hans J. Monrge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Knopf, 1962);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cGraw-Hill, 1979); William H. Reilly,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Richard Rosecrance, “Alliance and Structural Bal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 Re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March 1985);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Balance, and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nter 1991); Thomas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pring 1990);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pring 1985). Robert O. Keohane, “Alliances, Threats, and the Uses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1988);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July 1984); Charles W. Kegley, *When Trust Breaks Down: Alliance Norms and World Politics*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0);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s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94); Stephen M. Walt, “Why Alliance 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 (Spring 1997).等。

将如何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则十分不够。作者的任务就是要通过考察大西洋联盟(美欧联盟)及其载体北约组织在冷战结束、两极格局崩溃和它的主要威胁(苏东集团)消失的情况下作出了怎样的反应,并研究这些反应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意义。

研究北约组织和美欧联盟关系在冷战后持续存在和发展及其理论意义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其时机也是成熟的。首先,美欧联盟关系得以持续存在而且美欧双方在维持这种关系上有共同的愿望,从而在可见的将来不会让该联盟解体已经是个既存的事实。其次,作为这种联盟关系的载体——北约组织已经在几个方面完成了或者继续朝业已确定的方向针对欧洲安全新环境作出相应的调整。这主要是指它在成员、军事力量结构、新使命以及在区域外进行积极干预等政策调整。这些调整似乎使得北约更加适应了冷战后欧洲新形势的需要,它也为我们考察该联盟发展方面的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最后,有关美欧双方对各自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政策立场等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作出基本的判断。

在失去共同的苏联威胁的情况下,北约的未来本来应该有许多可能的选择:它可能失去联盟的内部凝聚力和发展方向,就如历史上许多联盟完成了击败对手的任务后很快就解体那样;它可能继续保留下来,但变得名存实亡,无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为军事联盟的有效作用;它还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美韩联盟一样,严格地将其功能限制在狭隘的军事合作和安全保证层面。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约的演变表明,北约迄今并无迹象显示它已名存实亡或者将走向解体,同时,面对欧洲安全新形势,北约在保持冷战时期集体防御功能的同时,也进行了多方面引人注目的调整。例如,同中东欧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制定吸收原华约集团国家入盟的计划,为自己在冷战后制定新的使命范畴,同意在北约框架内发展欧洲防务支柱,以及进行北约内部军事指挥结构的系列调整等。通过上述调整,美欧联盟得以继续保持,并且表现出加强的趋势。1991年,当时的北约秘书长韦尔纳曾声称:“1949年的《华盛顿条约》只字未提苏联,虽然苏联威胁不再存在,北约仍将持续存在下去,以服务各成员国利益。”^①

尽管如此,人们对于冷战结束后北约未来地位的怀疑还是广泛存在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欧洲有过许多关于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以取代冷战时

^① Manfred Womer, "The Atlantic Alliance in a New Era," *NATO Review* (Vol.39, 1991), p.3.

期北约和华约对抗的安全格局的建议或计划。例如,有人提出应该在欧安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类似联合国安理会的欧洲安全理事会,有人提出建立一个以大国协调为基础的集体安全组织,也有人主张复活戴高乐主义的“欧洲邦联”概念,还有人提到戈尔巴乔夫的“欧洲共同大家庭”的概念,主张在包括前苏联的全欧范围内建立一个新的集体安全体系,等等。^①加上北约在应对南斯拉夫解体后巴尔干地区出现的严重民族冲突危机上没能作出及时和有效的反应,人们对于北约在后冷战时代的价值产生了许多疑问。

冷战结束以来,我国学者一直十分关心北约和美欧联盟关系的演变。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学者对于北约这一美欧联盟组织在其成员、军事结构和使命等重要方面的调整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笔者集中查阅了1994—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出版的3种较多地发表有关研究联盟理论和美欧联盟关系变化的杂志——《欧洲》、《世界经济与政治》和《美国研究》,发现国内学者多注重分析北约这一美欧联盟组织在冷战后发生的相关演变,尤其是北约的扩大和北约新使命的调整,及其对欧洲国际关系的影响。此外,欧洲安全机制的演变,欧洲联盟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协调对美欧联盟关系的影响,美国和欧洲国家关系的演变,北约与俄罗斯、法国和东欧国家的关系也是国内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相对而言,国内学者在研究北约的持续存在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意义方面则很少涉及。^②统计发现有关介绍联盟理论的文章也非常少,只有一篇。这也部分地说明国内学者对于联盟现象的分析比较多,但是很少从理论方面对美欧联盟关

① Ken Booth and Nicholas Wheeler, “Contending Philosophies about Security in Europe,” in Colin McInnes ed. *Security and Strategy in the New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1992), p.4.

② 上述国内杂志涉及分析北约和美欧联盟关系演变的文章包括:成德:《冷战后北约与东欧国家的关系》,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7期;唐仁模:《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前景及其影响》,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7期;甘苏庆:《浅析法国重入北约军事机构》,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5期;叶自成:《北约东扩与美俄中的地缘政治》,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1期;胡宁:《冷战后北约的作用问题》,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2期;王乃成:《未来欧洲安全格局的主导权》,载于《欧洲》1995年第5期;王振华:《大西洋两岸关系的变化与欧洲安全机制的调整》,载于《欧洲》1996年第1期;朱立群:《欧洲安全结构中的西欧联盟》,载于《欧洲》1997年第6期;刘靖华等:《论北约东扩——地缘政治与文明特性的双重分析》,载于《欧洲》1997年第4期;肖元恺:《世纪之交的欧洲安全结构》,载于《欧洲》1997年第3期;赵怀普:《美国——欧洲关系探析》,载于《欧洲》1999年第6期;陈玉刚:《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机制及其能力评估》,载于《欧洲》1999年第4期;施玉宇:《北约新战略及俄罗斯对外政策探析》,载于《欧洲》1999年第4期;王乃成:《面对21世纪的新北约》,载于《欧洲》1999年第4期;李海东:《“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与北约的扩大》,载于《欧洲》1999年第3期;朱立群:《欧洲安全格局中的欧安组织》,载于1999年第1期等。

系的演变作出解答。^①

对于美欧联盟关系和北约组织在冷战后得以持续存在和发展的原因问题,西方学者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而这些探讨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的解释观点。

冷战结束之初,西方不少现实主义学派的学者认为,北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已经失去存在的理由,其作用理应逐渐减弱,乃至最终像华约那样走向解体。当促使某个联盟产生的威胁消失后,这个联盟为什么还会持续下去?许多现实主义者并没有深入地分析这个问题。当涉及这一问题时,许多现实主义者持有的一个大致的观点就是,在共同军事威胁消失的情况下,联盟的作用将会削弱,并最终走向解体;认为与历史上出现的许多联盟一样,北约也将不会持续存在下去。^②

长期以来,现实主义者研究联盟现象时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关于联盟形成的原因、联盟内部关系问题、联盟与战争的关系,以及结盟对于保护成员国安全利益的功能等,而很少系统地论述一个已经完成原先使命的联盟为什么还会存在的问题。经典的联盟理论著作,像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的《联盟的起源》和乔治·里斯卡(George Liska)的《结盟中的国家:相互依赖的有限性》也很少讨论一个成功的联盟最终的命运问题,原因大概就像赫尔曼(Gunther Hellmann)和沃尔夫(Reinhard Wolf)所说的:“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联盟,都在原先要应对的威胁弱化或消失后很快就相应地削弱或解散了。”^③确实,由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各种联盟所具有的功能,大多局限于盟国之间在军事上的协调和在防务上为应对共同外部威胁做准备,而很少发展起超越主要安全目标方面的其他功能,这使得从事联盟现象研究的现实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外部威胁”对于联盟的最初形成和保持凝聚力所起的作用。正如约翰·苏利文(John Sullivan)等人所评论的:“联盟通常是出于对外部威胁的反应而形成,而且它的凝聚力也很大程度上取决

① 参见于铁军:《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欧洲》1999年第5期。

② 例如新现实主义者肯尼思·沃尔兹认为没有了共同的苏联威胁,北约的崩溃如果说不是指日可待,那也会是若干年内就要发生的事情了。参见 Kenneth N.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all 1993), p.76。类似的观点还可参见: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1994), p.14;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reface to paperback edition, p.vii。

③ Gunther Hellmann and Reinhard Wolf, “Neorealism,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NATO,” *Security Studies* (Vol.3, 1993), p.16。

于这种威胁所具有的严重性和持久性……导致联盟解体的一个主要原因也将是它最初形成时要对付的那个威胁变弱或消失。”^①

这种对“威胁性强权”(threatening power)的集中关注同现实主义的思路是一致的。汉斯·摩根索(Hans Monrgenthau)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和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都认为,国家会通过结盟针对强权展开制衡,而这种现象(即通常所指的均势行为)将自动和反复地展开。^②新现实主义学派中由沃尔特所提出的威胁均衡理论则认为,国家通过结盟制衡的不单单是强权,更重要的是制衡威胁。^③总之,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无论是均势理论还是威胁均衡理论对于分析联盟的形成、联盟凝聚力的维持和联盟在其最初所对付的威胁消失之后的未来走向等问题都应该是有用的工具,原因在于,既然联盟的形成是出于对强权或威胁进行制衡的需要,那么,这种强权或威胁在联盟形成之后产生的变化自然也将反过来对该联盟的相应变化产生影响。由于结成联盟在享受集体防御带来的好处的同时意味着需要失去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要承诺对特定外部事件采取行动和一定程度的政策协调)以及分担一定份额的武装力量 and 资源,可以说结盟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正因为这样,当有成员觉得对联盟所负的义务变得没那么必要甚至得不偿失时,它会更不愿意让个体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从而降低联盟的凝聚力和持久性。正如格林·斯奈德所说的,联盟所要制衡的威胁或强权的力量越大,联盟的凝聚力也就越大;反之,如果强权威胁减弱或者消失(这或者通过均势格局的转换,或者由于联盟成员对于威胁的理解有了改变),那么联盟的凝聚力也将相应下降,并且最后可能导致联盟的解散。^④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分析,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东欧发生巨大变革,

① John D. Sullivan, Ole R. Holsti, and Terrence Hopmann, *Unity and Dis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lliance: Comparative Studie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73), p.88.

② Hans J. Mon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③ 参见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5;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pring 1985)。

④ Snyder, "Alliance, Balance, and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nter 1991), p.124.另外,沃尔特、苏利文和里斯卡等人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参见: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p. 17—26; Sullivan, Holsti, and Hopmann, *Unity and Dis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lliance: Comparative Studies*, pp.16—20; George Liska, *Nations in Alliance: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pp.61—115。

1991年4月华约组织宣布解散,同年12月苏联走向解体,北约各国不仅对于威胁的感知已经大大降低了,而且能够认识到权力转换的天平也已明显倾向有利于西方的一边。无论是威胁均衡理论还是均势理论都预测到,随着可感知的威胁的降低和敌手权力变弱,联盟的凝聚力将因而降低。根据威胁均衡理论,上述变化产生的意义是十分大的,因为西方所理解的威胁已经迅速地而且从根本上缩小了,其结果是,人们应当预料北约的凝聚力将变得松散,美国在北约的地位将受到削弱,而且盟国之间政策协调的程度将降低。根据均势理论,虽然冷战结束后继承苏联地位的俄罗斯保留了大部分的军事实力,但由于俄罗斯陷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昔日的超级大国反而迫切需要来自西方的经济援助,其总体实力已经大打折扣。加上苏联军队从阿富汗和东欧的完全撤出以及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同意履行此前苏联同西方达成的大规模削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协议,西方的相对权力地位已明显占据优势,其结果同样会导致西方联盟内部凝聚力的降低。

从成本和收益平衡的角度考虑,威胁均衡理论和均势理论也预测了在威胁性强权消失的情况下,一个传统联盟将在较短而不是较长的期间内解体。由于结盟要求作出相当的义务承诺(成本),现实主义告诉我们,联盟形成的前提必须是成员国觉得结盟得到的收益(例如获得安全)将超过其成本。如格林·斯奈德所分析:“对制定政策上自由度方面受到的束缚,结盟产生的政治和经济机会成本,以及因结盟而形成的义务分担都必须同结盟所能得到的收益相权衡。”^①任何相对成本而言的收益的降低因此将伴随着成员国对于付出成本方面的犹豫甚至抵制。以北约为例,《华盛顿条约》对于侵略发生时盟国之间互相提供援助方面的规定是十分明确的;为了对付共同威胁而要求盟国之间在政策上进行协调是有理由的;北约盟国之间在防务政策协调和出口控制协调方面造成一些国家付出的代价也是很高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将预期,随着原来证明有必要付出代价以对付的那个共同威胁的减弱直至消失,联盟成员将不再认为对联盟承担义务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还可以预期,联盟成员之间在某些涉及更多的成本付出和经济利益的联盟问题(如驻军、防务工业分工、制定政策的自主性等)方面将出现更多的

^① Gren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m First Cut, in Robert L. Rphthstein ed., *The Evolution of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p.91.

分歧,从而进一步侵蚀联盟的凝聚力。沿着这个思路,作为最初用于对付西方国家感受到的迅速增长的苏联威胁的北约,在这个威胁不再存在的情况下,常规的结论自然是认为它已失去继续存在的理由,并最终将走向解体。

最初,人们似乎可以看到现实主义者所作预测的远见。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华约组织和苏联的相继解体,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先后发生的政治和经济变革,以及前华约国家参加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现实主义理论对于北约作用将降低并最后解散的预测变得更有理由。1990年,沃尔特在为自己的《联盟的起源》一书再版作序时就认为,从1987年到1990年欧洲国际关系的发展证实了威胁均衡理论是正确的。^①赫尔曼和沃尔夫在90年代初的评论也认为,大西洋联盟内部发生的许多事件一时加深了人们对现实主义预测的认同:如北约各国争相削减军费开支和裁减军队;北约成员国之间在关于安全政策方面的分歧有了增加;美国在北约的领导地位受到法国等欧洲一些国家的质疑;欧洲许多国家对于北约之外的其他安全制度和组织(如欧盟、欧安会、西欧联盟等)的热情有了上升;等等。^②

但是,随着后来形势的发展,人们发现冷战结束后北约并没有像许多现实主义者预测的那样作用遭到削弱或解体。北约各国虽然纷纷削减军费开支和裁减军队,但总体上这些行为是在联盟内部达成协议的基础上进行的。虽然西欧国家在制定外交与防务政策问题上出现了基于西欧国家自身利益的发展(如提出共同外交与防务政策),但北约内部各盟国在政策上的“再民族主义”倾向(指在严格的个别国家利益基础上制定政策)并没有走得太远,尤其是,北约内美国领导下的军事一体化结构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挑战。甚至法国这样深受“戴高乐主义”影响的具有反对美国领导地位传统的欧洲国家也变得更加愿意参加在北约指挥下的某些军事行动。法国而且自90年代中期开始部分地重返了北约的军事一体化指挥结构(如北约军事委员会)。北约各国虽然在扩大北约和在防区外采取军事行动等问题上有分歧,但迄今并没有哪个成员国表示北约在维护它们的国家安全利益上变得不再重要,也没有哪个国家表示不愿意继续为北约提供必要的资源以维持其运转。与现实主义者的预测相反的是,北约已经增加了新的功能,它与许多非

① Stephen M. Walt, "Preface", in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90).

② Hellmann and Wolf, "Neorealism,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NATO," pp.21—25.

成员国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并且还在一步步地扩大,这已经成为非现实主义学派中许多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对主流的现实主义研究范式展开批判的一个重要根据。

自由主义理论中的几种假说——民主和平论、经济相互依赖理论和国际制度理论对于像北约这样的军事联盟能够在冷战结束后得以持续存在和发展提出了他们的解释。^①民主和平论者坚持认为,国际体系中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的存在将有助于形成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他们认为,在解释冷战后美欧联盟关系的持续和北约组织的发展演变方面,民主制在其中也起了关键作用,即所谓的“意识形态团结”对于联盟凝聚力的维持起了关键作用。在民主和平论遭到许多批评的情况下,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又认为,民主制度的扩展和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紧密化相结合应该有助于形成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他们认为,经济相互依赖通过增加国家之间的联系和增进相互理解可以促进和平。从这种强调经济相互依赖对和平与国际合作产生促进作用的论点出发,这部分自由主义者认为,在解释冷战后美欧联盟关系的持续和北约组织的发展方面,大西洋两岸的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另一部分自由主义学者以制度方法分析类似北约这样制度化水平高的联盟得以持续的原因。制度学派认为,一个联盟内部的制度化水平越高,它就越有可能在外部威胁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仍然持续下去。一部分制度论者则认为,制度容易维持是因为创造新的制度要比继续维持该制度的代价更为高昂,这样,即使条件发生变化,原有的制度仍可能存活下来。此外,近年来异军突起的建构主义理论也试图对联盟持续问题进行解释。建构主义者由于强调共享文化和身份认同在国际关系中起主要作用,他们因而认为在其他条件相等的前提下,国家更愿意同与自己享有相似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国家结盟,在面临均势格局或者威胁平衡的格局改变时,这样一种创造了共同身份认同的联盟被认为比独立国家为实现各自利益而形成的联盟更为持久。

面对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的关于为什么联盟还会继续持续的解释,沃尔特后来在《联盟为什么会持续或崩溃》一文中专门论述了他的作为现实主义学派的解释。沃尔特在这篇文章中将联盟能够持续的主要原因归

① 这些批评的观点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的相关内容。